

## 明代合肥地区的畜牧业述论

陈 瑞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 要】**出于加强国防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统治等现实需要,明王朝十分重视发展以养马养牛为主体的畜牧业。作为拱卫京师(后为南京)的重要屏障,明代合肥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以畜养马牛为主业的畜牧业养殖基地之一。明王朝特别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关于养马养牛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以及在具体牧养实践过程中对相关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对有明一代合肥地区马牛牧养业影响深远。有明一代,合肥地区的养马政策和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变更的过程,总的来看,养马户的负担有日渐加重甚至破产的趋势。为了减轻养马户的沉重负担,封建官府对合肥地区理应进贡的马匹实行了或豁免,或减征,或改征折色,或暂停征收所欠马价等变通措施。文献关于明代合肥地区养牛业的记载相对较少,但从中仍可看到当地官牛民养的一些实况以及养牛户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关键词】**明代;合肥地区;畜牧业;养马业;养牛业;朱元璋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4-0014-09

## A Review of the Animal Husbandry in Hefei Area in Ming Dynasty

CHEN Rui

(History Institute of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efei 230051)

**Abstract:** Ming Dynas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developing animal husbandry centered on horse and cattle raising, which was meant to reinforce its national defense, to improve its agriculture and to consolidate its feudal governance and sovereignty. As a strategic barrier and stronghold guarding the imperial Capital, which was later Nanjing, Hefei area in Ming Dynasty turned out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rming bases of horse and cattle husbandry. And in particular, the found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ant 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did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nimal husbandry in Hefei area. Correspondingly, through Ming Dynasty, the horse raising policy and system in this area experienced continuous modifications, which, by and large, resulted in an increasing burden upon the horse raisers and even subjected them to the danger of bankruptcy. In order to ease the raisers' burden, the feudal rulers practiced some flexible measures such as exemption, reduction and alteration to deal with the regular horse tribute to the emperor, or temporarily suspended the levy of the raisers' horse debt. The literature available about the cattle husbandry in Hefei area in Ming Dynasty, which is relatively rare, does reveal much about the local civilians' forced raising of official cattle and the resulting heavy burden on their shoulder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Hefei area; animal husbandry; horse husbandry; cattle husbandry; Zhu Yuan-zhang

---

**【收稿日期】**2016-05-05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合肥通史”(AHSKW2011D01)

**【作者简介】**陈瑞(1973- ),男,历史学博士,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徽学,社会经济史研究。

明代,出于加强国防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统治等现实需要,朱明王朝十分重视发展以养马养牛为主体的畜牧业<sup>①</sup>。作为拱卫京师(后为南京)的重要屏障,明代合肥地区<sup>②</sup>是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以畜养马牛为主业的畜牧业养殖基地之一。学界对明代合肥地区畜牧业研究不多,至今未见专论<sup>③</sup>。今掇拾史料,专文探讨明代合肥地区畜牧业的相关问题,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 一、明代合肥地区的养马业

### (一)与明代合肥地区养马业相关的制度规定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重视养马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在朱元璋主导之下,洪武年间制定了养马的相关法规条令和措施,并在具体的牧养实践过程中不断予以调整和完善。洪武六年(1373)二月,明朝制定养马之法,“命应天、庐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和等州民养马。江北以便水草,一户养马一匹,江南民十一户养马一匹。官给善马为种,率三牝马置一牡马。每一百匹为一群,群设群头、群副掌之。牝马岁课一驹。牧饲不如法至缺驹损毙者,责偿之。其牧地,择旁近水草丰旷之地。春时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时巡行群牧,视马肥瘠而劝惩之,任满,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为殿最焉。”<sup>④</sup>根据上述制度设计和规定,洪武初,地处江北的合肥地区,民间实行“一户养一马”的民牧制度;当地的马种由封建官府提供,牝马、牡马的饲养配置比例为3:1;以100匹马编为一群,群设群头、群副进行管理;牝马每岁课一马驹;因牧饲不如法导致缺驹损毙者,责令养马户赔偿;朝廷设有专门管理马政的机构——太仆寺,太仆寺官的主要职责是巡行督促养马户,并以养马肥瘠状况对养马户实施劝惩。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明太祖朱元璋诏令:“以典牧所系官马、牛分给庐州府属县民牧养。”<sup>⑤</sup>将原本属于官牧的马、牛分拨给庐州府属县民间牧养,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庐州府民间养马户养牛户的负担。洪武二十三年(1390)春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命江北民增至五户养一马。仍命太仆寺江南、江北各存牝马万匹为孳生种马,其余悉发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户再给钞三百贯,别市种马孳生,以补见缺之数。其正、从马二匹,官止岁收驹,余听民自鬻。”<sup>⑥</sup>此时,对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江北地方的养马制度做了一些调整,由原先的“一户养一马”改为“五户养一马”,养马户的负担稍稍有所减轻;为了弥补欠缺,鼓励孳生马驹,封建官府对养马户实施“每户再给钞三百贯”的补贴制度。洪武二十八年(1395)三月,针对“民间马户既养孳生马匹,又于有司供应差役,是一户而充两差,实为重复”,为减轻民间养马户的负担,朝廷罢除太仆寺群监官,以其马匹隶属地方有司牧养;并且重新确定了37个“管牧州县”,其中“庐州府无为州、六安州及巢、舒城、合肥、庐江四县”被包含在内<sup>⑦</sup>。

① 按,由于存世资料等原因,本文主要讨论明代合肥地区畜牧业中的养马业和养牛业。

② 按,本文所说的合肥地区是指今天合肥市下辖地区,在明代,主要是指合肥、巢、庐江三县。由于合肥、巢、庐江三县在明代属于庐州府管辖,庐州府治所在地为合肥县,为便于讨论,本文在论述相关问题时偶有涉及庐州府的内容。

③ 学界对明代合肥地区的畜牧业研究较少,只有周宗运、时维静《从〈元亨疗马集〉到〈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明清安徽畜牧与兽医成就》(《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王世华、李琳琦主编《安徽通史·明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和《安徽文化史》编纂工作委员会编《安徽文化史·中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论及明代安徽兽医学成就时,作为背景介绍有少许零星的提及。

④ 《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戊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⑤ 《明太祖实录》卷184“洪武二十年八月壬子”。

⑥ 《明太祖实录》卷199“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壬辰”。

⑦ 《明太祖实录》卷237“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戊午”。

成祖永乐四年(1406)二月,朝廷规定“直隶应天、太平、镇江、扬州、庐州、凤阳六府所辖五州二十九县,滁、和二州,全椒、含山二县,各增设州判官一员,县主簿一员,专理马政。”<sup>①</sup>由此可见,为了加强马政建设和管理,永乐初,在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主要养马区域增设了州判官、县主簿等相关官员,充实了马政管理力量。朱棣迁都北京后,出于加强边防、拱卫京师的现实需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养马的要求:“孳牲益蕃,增养马地方益广,更以五丁养一马。每儿马四匹,起其一以赴京备用,余者积银买马,备南京骑操。”<sup>②</sup>对此,《明太宗实录》也有记载:永乐十五年(1417)九月,朝廷再定应天、凤阳、滁、和等府州养马例,议定“凤阳、庐、扬、滁、和在江北者,五丁养一马”<sup>③</sup>。根据上述规定,这一时期合肥地区养马制度已由原先洪武年间的“一户养一马”、“五户养一马”改为“五丁养一马”,养马制度作了很大调整,养马户的负担较前有所加重。

到了孝宗统治时期,明王朝的养马政策又有所调整,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一些养马区域开始实行本、折色结合即征解马匹和征解折价银相结合的制度。弘治二年(1489)七月,兵部覆奏“南京太仆寺卿秦崇等所言举马政四事”,其中秦崇等提及:“南太仆寺岁所解备用马匹,自弘治三年为始,凤、庐二府并滁、和二州,以十分为率,请令解马七分,解折价银三分。”得到孝宗允准<sup>④</sup>。于此可见,此时合肥地区马匹征解实行本、折色相结合的制度,本、折色比例一度为7:3。弘治十六年(1503)正月,南京太仆寺少卿胡谅在奏疏中提及:“江北庐、凤、淮、扬四府所属并滁、和、徐三州,先以都御史张敷华奏:‘牧马群长皆五年一更,副群头革去。’”<sup>⑤</sup>此时,根据实际需要,对群长、副群头等马政管理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整。

到了武宗时期,马匹征解方面的本、折色比例再次发生了变更。正德十六年(1531)九月,南京给事中王纪请以江南北起表马匹,尽征价值,官自为买。兵部覆言:“种马骡驹起表系旧制,即如纪言,脱有边警,胡以取给?发直以鬻,猝亦难办。惟仍照正德二年间御史王济题请例,南京太仆寺派本、折色马共七千五百匹,本色三千七百四十九匹,折色三千七百五十一匹。应天、扬州、淮安、庐州、凤阳五府,滁、和二州本、折相半,宁国、太平、镇江三府,广德、徐二州俱听折色,则民称便,而马亦可恃以为用矣。”得到世宗允准<sup>⑥</sup>。由此可见,自正德二年(1517)开始,在武宗一朝,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庐州府马匹征解已改为“本、折相半”,即本、折色比例为5:5。

由上可见,明朝廷根据实际需要,对养马的相关制度和措施屡有调整和变更,这对有明一代合肥地区的养马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除了明代相关帝王实录的记载之外,合肥地区相关方志对明代马政的变化历程、马政的得失及其对合肥地区养马业的影响,也有所记载和评论。如万历《合肥县志》称:

明兴,高皇帝之立马政,至精至审,初论丁牧马,后更以田,免其租入以秣食,牝牡岁课驹上于太仆,民乐其省。久之,法稍弛,驹益以瘠,言官议拟备用,实弗用也。乃更履亩培财贾致,市马贡之,民间不复知赋马之出自种马,俾种马为虚器,一马政而二征于民,民日歎焉。呜呼,江淮之马政三变矣。计丁口则力协,其弊也,民流马无所归;故变而计田给之,则赋定,其弊也,土荒马无所赏;又变而率钱买马。至是孳生之意微矣。祖宗时岂不知江淮之牧不如汧渭之产,其所以蕃育气类,益虚以控实,殆有微意存焉尔<sup>⑦</sup>。

①《明太宗实录》卷51“永乐四年二月丁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②康熙《巢县志》卷9《田赋志·马政》,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③《明太宗实录》卷192“永乐十五年九月丙寅”。

④《明孝宗实录》卷28“弘治二年七月癸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⑤《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己丑”。

⑥《明世宗实录》卷6“正德十六年九月甲寅”,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⑦万历《合肥县志》上卷《食货志·马政》,明万历年刻本。

康熙《巢县志》称：

前朝洪武间，战马养于天下卫所，民间养马，止于江南江北数府而已。在江南，则十一户养一马，在江北则五户养一马。岁征一驹，外给官钞三百贯买附余种马一匹。如种马无驹，附余者有驹，则以附余者补数。若皆有驹，则卖一与本群无驹者偿官，其户内税粮，尽免征纳。永乐间，迁都北京，孳牲益蕃，增养马地方益广，更以五丁养一马。每儿马四匹，起其一以赴京备用，余者积银买马，备南京骑操。正统间，二岁征一驹。成化间，三岁征一驹。弘治十七年，以丁力不敷，命下议处，免粮田地养马。每田地二顷养一儿马，三顷养一驹马。每种马四匹，配一儿马，攒于一处，以便孳生。每五十匹为一群，内选群长一人，兽医一人。州县每乡各设牧马草场，惟英山以山险不设。弘治间，始以草场分给贫民开种纳租<sup>①</sup>。

顺治《庐江县志》记载称：

明洪武间，派江北地方五户养一马，岁征一驹，外给官……。成化三年，复二岁征一驹；十三年，奏准养马人户每十年一次审编。弘治六年，以江北丁力不便，议处免粮田地养马，每田二顷养一儿马，三顷养一驹马。以五十马为一群，内选一人作群长，一人作兽医<sup>②</sup>。

康熙《庐江县志》则记载称：

迨明洪武初年，战马养于天下卫所，民间养马止于江南、江北数郡。在庐五户养马一匹，岁征一驹，税粮量行免纳，谓之免征。永乐迁都北平，诏以五丁养一马，儿马四匹，起一赴京备用，余皆征银买马，以备骑操。正统间，诏二岁征一驹。成化间，诏三岁征一驹，以养马草场分给平民，开种纳租。弘治十七年，以丁力不便，诏议处免粮田地养马，田地二顷养儿马一，三顷养驹马一、牝牡各一，攒于一处，以便孳牧。约五十五匹为一群，群有长、有医各一人。州邑设牧马草场，唯英山以山险免设。嘉靖三十九年，太仆寺少卿赵鉞奏准，江淮马匹不堪备用，徒重民以倒死赔偿之累，每起俵一匹，额解折色银三十两。隆庆三年，准兵部奏议，民间种马孳生，不堪起俵，徒费民财，牧养议处，变卖一半，纳价助边，起俵本色，间二岁一征<sup>③</sup>。

由上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明朝廷对养马制度和相关措施不断进行调整和变更，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合肥地区民间养马户的切身利益和当地养马业的发展。

## （二）明代合肥地区的养马数量、马场分布及马政运作

### 1. 明代合肥县养马数量及马场分布

据方志记载，明代，合肥县原额养种印马 717 匹，其中牡马 144 匹，牝马 573 匹，后奉例减去 358 匹，止养牝牡马 359 匹，其中牡马 72 匹，牝马 287<sup>④</sup>。又据清康熙《庐江县志》记载，明代整个庐州府额养儿驹马共 4374 匹<sup>⑤</sup>，于此可见明代合肥县额养马匹占庐州府养马总数的 16.39%。

明代，合肥县境内共有 31 处马场，其具体分布情形如下：“火焰、马鞍、龙安、延陂，以上坐落东乡；大羽林、小羽林、万神二、九龙、永安、龙冈二、三里二、万年，以上坐落南乡；龙胜二、黑龙二、常安、葛城，以上坐落西乡；青龙、金斗、七里、迎山，以上坐落北乡；安胜二、小马、白龙二、梁店，以上坐落梁县

① 康熙《巢县志》卷 9《田赋志·马政》。

② 顺治《庐江县志》卷 4《官政志·马政》，清顺治十三年刻本。按，此处“兽医”应为“兽医”之误。

③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清康熙三十七年刻本。

④ 按，万历《合肥县志》上卷《食货志·马政》记载的此处数字为 217，当为 287 之误。

⑤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

乡。”<sup>①</sup>于此可见,东、南、西、北及梁县各乡皆有马场分布。而明代整个庐州府有牧马草场共 105 处<sup>②</sup>,于此可见明代合肥县牧马草场数占庐州府牧马草场总数的 29.52%。

## 2. 明代巢县养马数量、马场分布及马政运作

据方志记载,明代,巢县额养种马 190 匹,其中,儿马 38 匹,骡马 152 匹。而明代整个庐州府额养儿骡马共 4374 匹<sup>③</sup>,于此可见明代巢县额养马匹数仅占庐州府养马总数的 4.34%,规模较小。

明代,巢县境内共有牧马草场 13 处,其具体分布情形如下:“新安乡三处:新安厂、长龙厂、古牧厂。柘皋乡六处:下阁厂、包家坊厂、柘皋厂、铜场厂、岷山厂、龙胜厂。添保乡二处:高林厂、九龙厂。在城二处:兴安厂,在县北门外;河滩厂,在县西小河滩。”<sup>④</sup>于此可见,城乡各处皆有马场分布。据方志记载,明代整个庐州府有牧马草场共 105 处<sup>⑤</sup>,由此可见明代巢县牧马草场数占到庐州府牧马草场总数的 12.38%。

在巢县境内,至明中叶,“时孳驹类多弱小不堪,时行拣退,遂致逋欠数多,马户逃窜,而孳牧之法滞碍难行。”正德年间,御史王某奏准,令马户别买解用,官民颇便。至隆庆二年(1568),“奉本府帖文,为酌陈马政绪议,以备采择事。抄蒙南京太仆寺故牒,奉兵部札付前事,仰各府州县掌印官,将原养种马,从公选其老弱瘦小者,变卖一半。每马一匹,变价银十两,解部发寺备用。”根据上述规定,巢县将原额种马,拘集到官,验将老弱瘦小不堪者变卖 95 匹。每匹照征草料银 1 两解府,类解余马照旧。马户领养,共原马 190 匹。每岁折征草料银 190 两,解送北京兵部。又备用折色马各匹不等,共征银 1390 两 2 钱 1 分 7 厘,及水脚银 13 两 9 钱零。又据方志记载,明代,“民间设立牧场,后因废马不养,将草场荒地给与贫民领佃开垦。每年额征租银,起解滁州太仆寺。及天启间,军需孔亟,北京户部周题请变价充饷。本县(指巢县)恪遵,尽数丈量,变银解部充饷。”<sup>⑥</sup>由上可见,明代巢县马匹征解和马政运作经历了一个由本色到本、折色结合再到折色变银充饷的演变过程,从中也可以窥见整个有明一代该县马政的盛衰兴替过程。

## 3. 明代庐江县养马数量、马场分布及马政运作

据方志记载,明代,庐江县额养种马 510 匹,其中,儿马 102 匹,骡马 408 匹。而明代整个庐州府额养儿骡马共 4374 匹<sup>⑦</sup>,由此可见明代庐江县额养马匹数占庐州府养马总数的 11.66%。

明代,庐江县境内共有牧马草场 8 处,其具体分布和占地情形如下:齐安场,在安丰乡二图,田地 19 顷 64 亩 4 分 5 厘 2 毫;凤台场,在新兴乡一图,田地塘 29 顷 24 亩 1 分 7 厘;龙兴场,在三公乡二图,田地 7 顷 2 分 7 厘 6 毫;暖池场,在安丰乡一图,田地塘 8 顷 82 亩 7 分 8 厘 2 毫;铁脚山场,在北慕善乡一图,田地塘 2 顷 51 亩 6 分 2 厘;揪住山场,在南慕善乡一图,田地塘 2 顷 51 亩 6 分 7 厘;会龙场,在庐江乡四图,田地塘 3 顷 97 亩 6 厘 2 毫 5 丝;寨山场,在南慕善乡二图,田地 8 顷 97 亩 8 分 6 厘 5 毫。据清康熙《庐江县志》记载,明代整个庐州府共有牧马草场 105 处<sup>⑧</sup>,由此可见明代庐江县牧马草场数仅占庐州府牧马草场总数的 7.62%。

清顺治《庐江县志》对明代嘉靖年间庐江县马政的相关运作情况有所记载:嘉靖年间,庐江全县共

① 万历《合肥县志》上卷《食货志·马政》。

②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

③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

④ 康熙《巢县志》卷 9《田赋志·马政》。

⑤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

⑥ 康熙《巢县志》卷 9《田赋志·马政》。

⑦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

⑧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

设群长 10 名、兽医 10 名,俱以免粮人户金充。嘉靖九年(1530),该县设牧马主簿,按季点阅马匹,糜费无纪,谓之马群长,而充役之家无不消乏。嘉靖十年(1531),奉例裁革冗员,马政始清。然群长一名,犹费银四五十两,兽医半之,但此役不系金点殷实,止以挨次轮当。全县种马 510 匹,十年止用群长 100 户、兽医 100 户,而其余 310 户则空闲无事。“及十年,编审马册,则又以次如前,是劳者愈劳而逸者终逸,不均甚矣。”嘉靖四十三年(1564),知县刘裁具由申请,每一群长,以一儿、四骡攒役,兽医亦附之,免粮 1400 亩,每亩议银 2 分,亦足以供役。十年轮序一周,劳役适均,于民甚便<sup>①</sup>。由上可知,明嘉靖年间庐江县主要是通过设置群长(牧马主簿)、兽医等人员来进行马政运作与管理;当出现养马户“劳者愈劳而逸者终逸,不均甚矣”的情况时,为体现公平、达到“劳役适均”的目的,知县刘裁对现行马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改革。

关于明代庐江县马的饲养方式,原本是集中于牧马草场饲养,到了弘治九年(1496),由于“政弛厂废”等原因,改为“分养民家”：“孳牧之法,每骡马四匹配一儿马,攒于一处,以便群盖。故每乡各设马厂房屋并草场,地方管马官按季下乡点视,忝为民便。后政弛厂废,弘治九年,以场地给民开种,岁纳子粒,故马皆分养民家,每季赴县查点。”<sup>②</sup>

关于马匹的征解方式,根据相关制度规定,明代庐江县“起俵本折马”,即实行本、折色相结合的征解制度,但自弘治年间开始逐渐加大了折色征银的力度,到了嘉靖后期,又于马头名下带征军饷银,大大加重了马头、马户的负担。后虽然有知县刘裁攒审马册时“清出诡隐粮亩”的细微改革以及“因民贫详申军门带征银准免三分之一”的为民请命之举,但是庐江县境内马头、马户的负担依然十分沉重。对此,方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弘治九年(1496),骡马 4 匹、儿马 1 匹为一小群,逐年起俵本折马 1 匹,内轮一户承管赴京交俵,余 4 户帮贴,每马征银 24 两,后改征银 30 两。嘉靖三十七年(1558),添设总督军门,每亩带征银 6 厘,共 856 两 8 钱,以供军饷。其银俱于各儿、骡马头名下征完,纳户拖欠负累,马头包赔。又或马头收费,临时逃躲。嘉靖四十三年(1564),攒审马册,知县刘裁清出诡隐粮亩,将各人户应纳免粮银数开立厥经,呈府印发,金见年群长仪门外征收,令各户随粮多寡径赴收头交纳起解,不许马头包收侵费,纳户无拖欠负累,民甚便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知县刘裁因民贫详申军门带征银准免三分之一,民更德之<sup>③</sup>。

文献记载表明,在折色征银方面,明代庐江县折色马价等费用的征收主要依据田亩和丁粮:“养马有免征官民田地塘,牧马有铁脚等八场地,兽医于养马人户内金点。自免征本色以来,折色马价、兽医工食俱从合邑丁粮起派。前项人丁田地始归并里甲,一例当差矣。若牧地虽另设租赋,要不离乎田也。”<sup>④</sup>

#### 4. 明代合肥地区养马户的负担及减负举措

自明初开始,养马业便成为加在合肥地区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诸多养马户为此或屡屡拖欠,或倾家荡产,或家破人亡。上述这些情况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年份更是如此,对养马户的冲击也更为沉重。明代历朝实录对此多有反映:洪武二十八年(1395)冬十月,太祖朱元璋对兵部臣说:“江淮养马之民,遇有马死,有司令其买补,乃去家离业,购于远方,至有历年不返毙于道路者,朕甚悯之。”<sup>⑤</sup> 宪宗成化三年(1467)九月,户部会六部等衙门官议漕运总兵及各处巡抚等官听言事宜条奏,其中提及:“直隶淮、扬、庐、凤四府,徐、滁、和三州,地势卑湿,不利畜牧,致解官之马多以不堪退回。”<sup>⑥</sup> 成化二十二

① 顺治《庐江县志》卷 4《官政志·马政》。

② 顺治《庐江县志》卷 4《官政志·马政》。

③ 顺治《庐江县志》卷 4《官政志·马政》。

④ 康熙《庐江县志》卷 6《兵驿·马政》。

⑤ 《明太祖实录》卷 242“洪武二十八年冬十月辛亥”。

⑥ 《明宪宗实录》卷 46“成化三年九月癸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年(1486)春正月,兵部在覆议时提及:“先巡抚凤阳等处都御史刘璋所奏,淮、扬、庐、凤四府,徐、滁、和三州,土地卑湿,与江南等产马小弱,每岁重价买纳,多被验退,折阅转售,复破产追赔,民困殊甚。”<sup>①</sup>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月,户部会各部都察院并漕运等官议上漕运等事宜时提及:“直隶庐、凤二府及应天府江浦县弘治元年解京马匹,请暂照江南事例,每匹折收银十二两,以苏民困。”<sup>②</sup>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四月,“巡抚凤阳都御史张缙以淮、扬、凤、庐四府及滁、和二州灾荒民困,请令印马御史止将见有马驹照例印烙,其民间倒失并亏欠者,俟年丰时印补。”得到孝宗允准<sup>③</sup>。武宗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暂免凤、庐、淮、扬四府,滁、和、徐三州正德二年以前积欠马匹,以地方灾伤重大故也。”<sup>④</sup>世宗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以应天、庐、凤等府灾伤,暂停征所欠马价。”<sup>⑤</sup>同年十二月,朝廷下令“停征淮、扬、庐、凤、徐、滁、和等府州嘉靖元年、二年,未及三年额办牲口,俱俟年丰带征。”<sup>⑥</sup>嘉靖十九年(1540)六月,“以灾伤改庐、凤、淮、扬、徐、和、滁等处本年马为折色。”<sup>⑦</sup>嘉靖二十年(1541)三月,“以灾伤诏庐、扬二府,和、滁二州所属州县,备用马匹改征折银。”<sup>⑧</sup>嘉靖三十三年(1555)十二月,“以庐州、淮安二府灾荒,准改折预征本色马匹三分之一。”<sup>⑨</sup>神宗万历八年(1580)三月,根据南京太仆寺卿萧廩的请求,下令“裁庐、凤、淮、扬四府本色马匹。庐、凤减七分为六分”<sup>⑩</sup>。熹宗天启七年(1627)七月,巡视屯马御史李时馨在奏疏中提及:“今日马价,庐、凤、淮、扬欠至二十万有余。”<sup>⑪</sup>

为了减轻养马户的沉重负担或给养马户以一定的喘息时间,朝廷常对合肥地区理应进贡的马匹实行或蠲免,或减征,或改征折色,或暂停征收所欠马价等变通措施。其中,蠲免的事例,如顺治《庐江县志》称:“蠲赋……此外又有诏赦蠲免节年逋负钱粮物料马驹等项,此皆惠政之大者。”<sup>⑫</sup>将蠲免马驹视为“惠政”。方志记载了明代该县蠲免种马及驹的一些具体事例:宣德十年(1435),免种马并驹 156 匹。正统四年(1439),免种马 47 匹;十四年(1449),免马驹 69 匹。景泰六年(1455),免马驹 519 匹;七年(1456),免粮马并驹 713 匹。天顺元年(1457),免马驹 150 匹<sup>⑬</sup>。减征的事例,如万历八年(1580),朝廷下令“裁庐、凤、淮、扬四府本色马匹。庐、凤减七分为六分”<sup>⑭</sup>。改征折色的事例,如嘉靖十九年(1540),因灾伤缘故改庐州府等地本年马为折色<sup>⑮</sup>;嘉靖二十年(1541),因灾伤缘故诏令庐州府等地“备用马匹改征折银”<sup>⑯</sup>。暂停征收所欠马价的事例,如嘉靖二年(1523),因灾伤缘故暂停征收庐州府等地所欠马价<sup>⑰</sup>。

①《明宪宗实录》卷 274“成化二十二年春正月甲戌”。

②《明孝宗实录》卷 5“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己丑”。

③《明孝宗实录》卷 223“弘治十八年四月辛巳”。

④《明武宗实录》卷 44“正德三年十一月丁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⑤《明世宗实录》卷 33“嘉靖二年十一月辛未”。

⑥《明世宗实录》卷 34“嘉靖二年十二月戊申”。

⑦《明世宗实录》卷 238“嘉靖十九年六月己卯”。

⑧《明世宗实录》卷 247“嘉靖二十年三月戊戌”。

⑨《明世宗实录》卷 417“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甲午”。

⑩《明神宗实录》卷 97“万历八年三月己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⑪《明熹宗实录》卷 86“天启七年七月丁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⑫顺治《庐江县志》卷 4《官政志·惠政》。

⑬顺治《庐江县志》卷 4《官政志·惠政》。

⑭《明神宗实录》卷 97“万历八年三月己酉”。

⑮《明世宗实录》卷 238“嘉靖十九年六月己卯”。

⑯《明世宗实录》卷 247“嘉靖二十年三月戊戌”。

⑰《明世宗实录》卷 33“嘉靖二年十一月辛未”。

## 二、明代合肥地区的养牛业

### (一)明代合肥地区养牛业概况

牛是明代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畜力之一，明朝各级官府十分重视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养牛业的发展。然而，与养马业的广泛记载相比，《明实录》等官方文献关于明代合肥地区养牛业的记载较少。仅有《明太祖实录》记载说，洪武二十年（1387）八月，朱元璋曾下诏令：“以典牧所系官马、牛分给庐州府属县民牧养。”<sup>①</sup>于此可见，明朝廷曾通过行政命令将原本属于官养的牛分拨给庐州府属县民间牧养。

方志对于明代合肥地区的养牛业有一些零碎的记载，如据万历《合肥县志》记载，明代，合肥县原额养牛 66 只，其中犍牛 24 只、母牛 42 只<sup>②</sup>。

就明代巢县的养牛业而言，清康熙《巢县志》记载明代马政时曾提及：“旧种马后附以种牛，今其略具牛犊银一款之下，不更载。”<sup>③</sup>康熙《巢县志》在介绍明弘治年间及此前巢县境内农民垦荒时也曾提及：“昔弘治初年所志‘风尚’……又云：……贫农佣佃耕种，租牛垦土。”<sup>④</sup>上述记载反映了明代巢县境内“租牛垦土”即以牛为畜力以及养牛业的一些侧面。

关于明代庐江县民间养牛业的相关情况，清顺治《庐江县志》有所反映：

洪武间，分派民间养牛。弘治二年，奉例额派免征无粮人户领养牛。二年，依例五丁朋养一牛，市民亦如之。每母牛二岁征一犊，如无孳生者，准作亏欠，纳银三钱。堪中者印记，不堪者变卖。印过者俵与解过牛户领养，供南京内府、光禄寺等衙门取用。验出不堪者，就彼发付典膳所喂养。十六年，以实征人户丁田相应者，每十丁养一牛，作二起，五丁轮养一年。若遇派取，就令该年人户解俵，每二岁征一犊。本县原拟额养犍、母牛二<sup>⑤</sup>十三只：犍牛六只，母牛二十七只<sup>⑥</sup>。

由上可见，明初洪武年间官府就开始强令庐江县民间养牛，到了弘治年间，为了减轻养牛户的负担，开始实行朋养制。从方志所载额养犍、母牛 33 只这一数字看，当时庐江县养牛业的规模不大。

### (二)明代合肥地区养牛户的负担及减负举措

与养马负担较重一样，养牛业也是加在明代合肥地区人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在遇到灾荒年份更是如此，不少养牛户因此而破产。如弘治二年（1489），南京太仆寺卿秦崇等提及：“凤阳等府所养官牛数多而支用数少，牧养陪补甚为民累。往尝奏准凤阳止留三千只，庐、扬二府及滁、和等州共留二万只，然尚有不均之叹，请于二万只内留犍牛八百、牝牛千二百，令庐、扬等府州均派所属牧养，岁资其牛犊之用，尚余一万八十只，请鬻银解太仆寺贮用，以便民。”<sup>⑦</sup>此处所谓“牧养陪补甚为民累”，揭示了明代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广大地方养马户的辛酸苦累。嘉靖七年（1529）十二月，巡抚凤阳都御史唐龙在给世宗皇帝的进言中称：“庐、凤、扬三府及滁州，频岁灾荒，请暂宽种牛亏欠倒失者，俟丰年买补。”<sup>⑧</sup>

①《明太祖实录》卷 184“洪武二十年八月壬子”。

②万历《合肥县志》上卷《食货志·马政》。

③康熙《巢县志》卷 9《田赋志·马政》。

④康熙《巢县志》卷 7《风俗志·四民》。

⑤按，此处“二”应为“三”之误。

⑥顺治《庐江县志》卷 4《官政志·马政》。

⑦《明孝宗实录》卷 28“弘治二年七月癸未”。

⑧《明世宗实录》卷 96“嘉靖七年十二月乙酉”。



于此可见,在频岁灾荒情境之下,养牛户因“种牛亏欠倒失”往往损失惨重。为了减轻包括合肥地区在内的广大养牛户的沉重负担,一些大臣提出了“请鬻银解太仆寺贮用,以便民”、“请暂宽种牛亏欠倒失者,俟丰年买补”等带有权宜之计性质的补救措施。

###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出于加强国防力量、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统治等现实考量,明王朝十分重视发展以养马养牛为主体的畜牧业。作为拱卫京师(后为南京)的重要屏障,明代合肥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为重要的以畜养马牛为主业的畜牧业养殖基地之一。明王朝特别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关于养马养牛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以及在具体牧养实践过程中对相关制度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对有明一代合肥地区马牛牧养业影响深远。有明一代,合肥地区的养马政策和制度经历了“一户养一马”、“五户养一马”、“五丁养一马”以及本色、本折色结合、折色等不同阶段的动态调整和变更,总的来看,养马户的负担有日渐加重甚至破产的趋势。为了减轻养马户的沉重负担或给养马户以一定的喘息时间,封建官府对合肥地区理应进贡的马匹实行了或蠲免,或减征,或改征折色,或暂停征收所欠马价等变通措施。与养马业的广泛记载相比,官方文献关于明代合肥地区养牛业的记载相对较少,但从中仍可看到当地官牛民养的一些实况以及养牛户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 [参 考 文 献]

- [1] 王世华,李琳琦.安徽通史·明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 [2] 《安徽文化史》编纂工作委员会.安徽文化史·中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 周宗运,时维静.从《元亨疗马集》到《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明清安徽畜牧与兽医成就[J].中国农史,1985,(3).
- [4] 李元放.中国古代畜牧业经济(续)[J].农业考古,1986,(1).
- [5] 安 岚.中国古代畜牧业发展简史(续)[J].农业考古,1989,(2).
- [6] 陈 瑞.明代合肥地区农业发展的举措与成就[J].中国农史,2015,(3).

~~~~~  
(上接第 13 页)

### [参 考 文 献]

- [1]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7,(6).
- [2] 史念书.清末民初我国各地茶业振兴纪实[J].农业考古,1991,(2).
- [3] 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流通环节考察[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1).
- [4] 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J].中国农史,1996,(2).
- [5] 陶德臣.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
- [6] 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商的经营状况[J].近代中国,2000,(10).
- [7] 陶德臣.中国传统市场研究——以茶叶为考察中心[M].北京:长虹出版公司,2013.
- [8] 王 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4).